

● 卢有泉 著

北朝诗歌研究

BEICHAO
SHIGE YANJIU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北朝 诗歌研究

● 卢有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朝诗歌研究/卢有泉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440 - 6289 - 3

I. ①北… II. ①卢…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词研究 - 中国 - 北朝时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158 号

北朝诗歌研究

BEICHAO SHIGE YANJIU

责任编辑 康 健
复 审 杨 文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0351 -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 75
字 数 36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6289 - 3
定 价 46.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3552369。



朝
歌

目 录

绪 论 /1

上 编 /15

第一章 北朝诗歌的生态环境 /17

- 第一节 北朝诗人的生存环境 17
- 第二节 北朝诗歌生成的文化环境 21
- 第三节 北朝诗歌生成的文学环境 25

第二章 北朝诗歌的发展历程 /67

- 第一节 十六国诗坛 67
- 第二节 从平城到洛阳——北魏诗坛 71
- 第三节 东魏与北齐诗坛 91
- 第四节 西魏与北周诗坛 105

第三章 北朝歌诗（附杂体诗、仙道诗） /113

- 第一节 北朝歌诗的范围、创作与保留 113
- 第二节 北朝歌诗的传播 121
- 第三节 乐府民歌——北方社会风情实录 128
- 第四节 北朝谣谚的文学意义与史学价值 136
- 第五节 北朝文人乐府诗、杂体诗及仙道诗 147
- 第六节 北朝民歌奇葩——《敕勒歌》《木兰诗》 155



第四章	北朝诗人的身份类型与地域特征 /167	
第一节	本土诗人群的身份类型	167
第二节	以罪臣、叛将、俘虏为主的南来诗人群	179
第三节	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184
第五章	北朝诗人的创作观念 /196	
第一节	从北朝诗话看北朝诗人的创作观	196
第二节	北朝诗歌的创作主向	203
第六章	北朝诗歌的抒情特征 /207	
第一节	北朝诗的抒情模式	207
第二节	本土诗人的抒情取向	211
第三节	萧梁遗民诗人的独特情感体验	213
第七章	北朝诗歌的艺术特质 /218	
第一节	北朝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218
第二节	从南北文风的比较中看北诗之风格	226
第八章	北朝诗歌的诗史意义 /233	
第一节	北朝诗的独立品格与价值	233
第二节	唐诗对北朝诗学精神的继承	237
下 编 /249		
第一章	“北地三才”诗论 /251	
第一节	温子昇及其诗歌创作	251
第二节	邢邵及其诗歌创作	258
第三节	魏收及其诗歌创作	266
第二章	王褒的诗歌世界 /274	
第一节	王褒的生平与思想	274
第二节	王褒前后期诗歌创作之比较	277

第三节 王褒诗的艺术特质	287
第三章 庾信的诗歌世界 /293	
第一节 庾信的生平与仕历	293
第二节 庾信的思想与诗观	297
第三节 宫廷诗人——庾信的前期角色	305
第四节 亡国诗人——庾信后期的身份及其诗作	311
第五节 庾信诗的艺术魅力及其影响	320
附录（一） 十六国主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327	
附录（二） 平城时代主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328	
附录（三） 洛阳作家群主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329	
附录（四） 晋阳作家群主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331	
附录（五） 长安作家群主要作家创作情况一览表 /333	
主要参考文献 /335	
后记 /341	

绪论

文学创作本是作家的自主行为，是作家个体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的艺术显现。然而，缘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生成环境和价值构成，无论哪个时代，作家既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也是某一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其情感、心志和日常生活往往依赖于社会和政治的安排，文学创作也很难是自由、自足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也正因了“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①。所以，当我们在探讨4世纪末至6世纪末这200年间的北中国文学（即北朝文学）时，有必要先对创作这一时段文学作品的诸作家所处的“当代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空间，做一简单的回视。或许，正是这历史的诸元，最终确定了这段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有风貌、走向，及其质的规定性。

我们这里所谓的“北朝文学”，其发生的时段，基本限定于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重建代国）至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其发生的地域，包括现在的华北、西北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而此时此地活跃于权力场的主角，正是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鲜卑拓跋部本世居于大鲜卑山的嘎仙洞（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东汉初，趁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迁之机，进入匈奴故地，并经过大量兼并其他游牧部落，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雄踞于北方草原。到公元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不久，定都于盛乐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改国号“魏”,称登国元年,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正式建立。之后,拓跋铁骑四出扫荡,逐次征服“五胡十六国”及北方诸部族,于439年统一北方。

北魏王朝从公元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到公元494年孝文帝出于统一中国和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需要而再次迁都洛阳,统治中心一直在晋北,时近百年,史称“平城时代”。而以中原为统治中心的“洛阳时代”,从迁都到公元534年北魏王朝一分为二(即东魏、西魏),仅四十年。东魏及后来代之的北齐王朝(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逼东魏孝静帝禅位,自为皇帝,北齐建立),均都于邺(在今河北临漳县境),但高氏一直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为大本营。所以,从公元534年东魏建政直到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这四十四年虽以邺城为都,实际的统治中心却是晋阳。至于西魏及代之的北周王朝(公元556年,西魏恭帝禅位,宇文觉称帝,改国号周,史称北周),皆以古都长安为都,直到公元589年北朝结束。

一般而言,王权之中枢既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人文荟萃,华章悦目,足堪领风气之先。因此,我们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应更多地把目光投放到其文化的中心地带,以作家群体的产生及其活动空间为切入点,由中心辐射四方,在时代文风和群体作家的宏观观照中,突出个案研究。如此,似更能彰显一代文学之本真。而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把北朝文学分作四个板块,即平城文学、洛阳文学、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在时间上,洛阳文学是平城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是洛阳文学的发展和分歧,而晋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又同时存在。在地域上,平城文学的中心是北魏都城平城,是处虽偏踞塞北,但当时却是人口过百万,各族共居、市面繁荣的北方大都。这里集中了几乎所有入魏的文化精英,如崔浩、高允、张湛、宗钦、张渊等,他们或作诗唱和,或相互切磋学问,以个人化的创作和群体的贡献,昭示了平城文学的存在。晋阳文学是北朝文学的高峰阶段之一。从北魏末年到东魏、北齐,尔朱氏和高氏均长居晋阳,以重兵遥控洛阳、邺城。据史书载,当时邺都朝堂冷清、街市凋敝,毫无王气。而晋阳经高氏的苦心经营,不仅宫室巍峨远胜于邺都,而且,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文士汇聚,俨然霸府之所在,文学之中心。

平城和晋阳分别位于山西北部、中部的大同盆地和太原盆地。大同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四周群山环绕，关险重重，盆地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既宜于农耕，也适合放牧。踞有此，进可以攻城略地，退可以修养自给，是理想的建都之所。且当时该地自然环境也不似有些史书说的荒凉不毛，就平城四周，“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濩”^①，显然塞北江南（按晋北河流干涸、植被破坏，当是近三十年的事）。这样的环境，也有益于文人的生存和文学情趣的养成。据《魏书》载，孝文帝当年面对平城河山，诗兴大发，曾与臣子效柏梁联诗。太原盆地与大同盆地颇多类似，高欢就是以其地处“四塞”，才建大丞相府、屯集重兵、遥控中原的。所谓“四塞”，就是其地“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故亦以为四塞之地”^②。而地处河北平原南部的邺城，根本无此地利之便。再者，晋阳到北魏末已有了近千年的城市历史，不仅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而且，环境幽美，人居适宜，文脉绵长，一直是晋地的文化中心。而这样的地缘优势，也为北魏文学的培育、发展并终于达至成熟提供了优质的土壤。

至于洛阳文学和长安文学，因洛阳、长安曾长期是帝都所在，国之中枢，王气凝聚，自然、人文环境优越，作为文学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北魏在洛阳时代仅有二十几年的和平安宁，其后朝政纷乱，国变不断，但当时洛阳“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③。经济的繁荣，再有平城、江左的文人汇聚于此，凝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潮流，为北魏文学最终走向成熟做了充分的准备。而长安自北魏分家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很少继承洛阳时代的资源，比之晋阳，文势单弱，几乎白手起家。加上初期宇文氏实行军事统治和胡化政策，一度胡风蛮语，文明退步，文事凋敝。然而，长安既为王化重镇，又背靠厚重的关陇文化，后来宇文氏也渐重文治，又有南方文人滞留，南北文化交融，终于开创出

① 《水经注》卷十三，岳麓书社，1995年，第195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胡三省注，“四库全书荟要”本。

③ 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中华书局，1978年，第161页。



一片新的文学天地。

北朝文学的四个板块，尽管缘于各自作家所处的自然和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分歧和不同的发展风向，但它们又共生于一段具有相似政治文化理念的历史和地域中，相近的文化背景，又决定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那么，作为北朝文学的背景——4 世纪末到 6 世纪末这 200 年间北中国的文化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共存互补，孕育了一代国民宽厚豪放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早在东汉末，北方游牧民族就开始大量内迁，山西汾河中下游是当时匈奴的聚居地，史载并州户 3 万，南匈奴即达 2 万，远远超过汉民。晋末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在北中国建立多个政权，直到公元 439 年鲜卑人统一北方。

游牧民族的内迁，打破了原住汉民封闭、整一的农耕生活，注入了游牧文化的新鲜血液，使两种文化形态在此长期共存互补。从北魏王朝的历史走向看，虽然鲜卑人入主北方后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但似乎又在不断地打破两种文化的界限而向农耕靠拢。在物质层面上，鲜卑人仍把畜牧和狩猎当做谋生的手段之一，如公元 415 年，平城一带旱荒严重，王亮等力劝明元帝拓跋嗣迁都邺城，崔浩曾言：“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① 到魏末，牧场仍遍于国中，使统治者“为安民常‘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②。但这时农耕无疑也是生活的主要来源，拓跋珪时就将鲜卑人“编户”，并“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③。特别是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后，农耕已成了王朝经济的支柱、国民生存的依赖，连孝文帝都“耕藉田于平城南”，为民示范。在制度层面上，当鲜卑人带着他们那一整套适合游牧的管理模式进入封建制完善的中原地区后（其实，这时鲜卑人刚刚脱离氏族社会步入农奴制），出于统治的需要，很快向先进的汉民学习，于是，先有一系列的制度修正，如道武帝采纳清河崔

①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华书局，2000 年，第 546 页。

② 《魏书》卷八《世宗纪》，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43 页。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903 页。

氏、渤海高氏等汉文化精英们的建议，用汉制的父死子继替代鲜卑原有的兄终弟继，使用汉的礼乐教化鲜卑子弟等等。之后，孝文帝重用汉族士人，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先后实施俸禄、均田、三长制，完全用汉的制度规范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语言、服饰、婚姻、礼仪、职官及姓氏籍贯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北魏末，游牧文化基本融入了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中。

两种文化的结合虽自始至终充满了不甚和谐，甚至激烈的矛盾交锋，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的移植和互补往往会催生出新生命的活力，正如某些植物的移植，在新的土壤环境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本来鲜卑民族就是一个勇于探求、不断进取的民族，在其部落首领的带领下，从嘎仙洞到大漠再到塞北，直至中原腹地，一路走向文明，加之草原牧民固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性情和宽厚、守信、大度的品行，一旦移植到汉民族的文化沃野，与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结合，定会迸发出新的生命的火花。也正因为北朝这种独特的文化态势，经过二百多年的存在，对国民性的改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培养了北方先民一种宽厚豪放的个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北朝最终灭掉南朝，正充分显示了这一国民性的优越和这种文化互补的强大生命力。

（二）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导致思想文化的兼容并蓄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共存。

从人类的文明进程看，各族的融合、诸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是促成一个时代开放与充满创新精神的重要元素。

自晋末大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登上了北中国的历史舞台，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激烈冲突和空前的大融合，最后融入汉民族大家庭，成为华夏一员。因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北中国的各民族大融合的主体趋势始终是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即先汉化，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然后逐步相互融为一体。

南匈奴于汉末进居今山西晋北、晋中一带后，与汉人杂居并很快放弃游牧从事农耕。刘渊就是汉化较深的匈奴人，故其后建立的割据政权称“汉”，以后继刘汉政权为号召。羯人早在西晋时入居今山西榆社一带，与汉人杂居中学习农事，然后弃牧从农。石勒崇儒学、取汉名，也

是汉化较深的羯族杰出之士，其建立的割据政权称“赵”。氐族和羌族亦于西晋时内迁，氐人苻坚建立前秦政权后，即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并重用汉人王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不仅劝课农桑、计口授田，重用汉人崔氏家族及高允、张袞等，还在征服其他割据政权中，按鲜卑人习俗，每征服一地，均将当地人畜掳入京师，以为战利品。据史载，拓跋氏为充实京畿人口，自迁都平城后，先后将四十多万鲜卑人和九万多高车人迁入。再如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①。又永兴五年（413年）七月，“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而旋。”^②又泰常三年（418年）“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慕容部）于京师”^③。至北魏末，内迁各族长期共处，来自草原的少数民族已基本接受了农耕技术和汉族的思想理念，同时也将自身的一些东西，诸如风俗、文化、劳动技能等带给汉人，胡汉冲突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特别是经孝文帝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式对鲜卑等民族进行全面汉化改造后，胡汉已为一体，这场空前的大融合遂告完成。据山西现存的一些家谱记载，元、杜、单、薄、路等姓皆出自北魏的少数民族，且后代不乏名家辈出。如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即为鲜卑皇族拓跋氏后裔。

不过，民族的融合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简单的谁征服谁的问题，而是诸民族之间包括婚姻、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制度等多方面的相师相容，最后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而这个新体相对于之前的各部，往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正如近人林语堂先生所言，“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言和体格上……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长期生存下来”^④。而后来发生的兼并战争，北方总是胜过南方，也客观上证实了这种融合的成功。具体在形而上的表现，就是思想文化的兼容并蓄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共存，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① 《北史》卷一《魏道武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

② 《北史》卷一《魏明元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19页。

③ 《北史》卷一《魏明元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20页。

④ 林语堂：《中国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北朝文化思想兼容现象的出现，除民族大融合的元素外，还与统治者大有关系。即北朝前期多马上皇帝，又来自漠北草原，既是大老粗，再加上连年的征服战争，根本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的建设。因而，统治思想制度化的缺失，客观上也导致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的长期并存共生。但从总体上看，北朝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在民间）是以佛教为主流的，而北魏的前期则是道教长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并以道教为国教的。

鲜卑拓跋氏于4世纪末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后，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开始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并有意识地以中华正统宗教——道教为国家意识形态。道武帝及其子元明帝都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据传，二人皆是因炼丹药求长生而终被药毒死的。太武帝与其重臣崔浩亦信道，曾积极支持寇谦之进行道教改革。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寇称太上老君降临，以天师之位授之，并告以“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①。经寇改造过的五斗米道一扫过去的繁文缛节，修行简便，称北天师道，受到了北魏上层的普遍尊崇。寇被太武帝尊为国师，太武帝还在平城设道场，亲受符箓，以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承上天之命而为中国皇帝的。此后，北魏凡新帝即位，都要举行受符箓仪式，以之为合法的依据。因此，道教俨然是北魏王朝的国教。

但从寇谦之改革道教的具体举措看，他主张“兼修儒教”、“佐国扶命”，实际是把儒家的伦理信条也纳入了道教的规诫中。本来，儒道二家的经典阐释，自始至终都是互为渗透混同的，而经寇谦之的整合，北魏的上层统治者实际二道兼修，从不彼此排斥。尽管道教是国教，儒家思想及其一整套的礼制秩序却在王朝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平城到洛阳，国家的运行规范正是按儒家的礼制建设的，到孝文帝时已趋于完善。就以太武帝灭佛而言，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在其灭佛诏书中说，佛教使“政教不行，礼仪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②。显然，这是从维护儒家文教、礼仪的层面进行灭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1页。

②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2017页。

佛的。

虽然佛教在北魏初期曾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与儒、道相比，看似处于弱势，但从北朝的整部历史看，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却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民间乃至王朝上层，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强大的势力。早在太武帝灭北凉时，就将三千僧徒连同数十万平民俘至平城，佛教由此大盛。尽管他在位时进行了历时七年的灭佛，但他的儿子文成帝即位后很快即下诏兴佛。据有关资料记载，到公元515年，北魏境内即有13700余座寺院，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道场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仅从寺院数量看，北朝的佛教之盛一点也不亚于南朝。而且，在今天看来，北朝为我们留下的佛教文化遗产还远胜于南朝。比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及堪与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媲美的太原蒙山大佛（近几年发现并修复）等，已是人类文化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释、道、儒三教兼容共存，是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共性，而在整个北朝显得尤为突出。一个长期游牧于大漠南北的马背民族，一旦投入汉文化博大精深的怀抱，自身思想文化的空白，很容易被汉族的既有思潮点染。于是，儒家治人治世的仁义忠孝思想和礼乐制度，道家崇尚自然、寡欲无为的理念和服药长生、羽化成仙的诱惑，佛教忍辱负重、苦修向善的人生态度和内中蕴藏的人生智慧、色空思想等等，足以让这个贸然闯入者和新世界的主宰者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治国治民的手段和信条。因而，在鲜卑民族治下的北朝二百余年，释、道、儒三教皆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任凭某统治者欲以一己之私而兴此灭彼，终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兼容共存，影响深广，及至今日所见北方诸多寺庙，往往三教共存、诸神共奉。如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寇谦之弟子李皎组织兴建的北岳恒山悬空寺，其中的“三教殿”供奉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塑像，是典型的三教合一寺院。而当时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不少杰出之士，本身即兼具释、道、儒等多元的文化素养，他们的思想言行，必然影响广泛，甚至引领时代之风气。像佛教净土宗初祖雁门人昙鸾（476—542），从小就涉猎诸子百家，尤精于道家，壮年还曾就江南道士陶弘景学道，后却北归故土皈依佛门，于汾州玄中寺（今山西交城县西北）著书立说，聚众念佛，终成一代宗师。当时的孝

静帝非常敬重昙鸾，称之“神鸾”，思想亦多受其影响。北魏初年行走于上层社会的寇谦之、崔浩父子等人，也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们对急于做中土主人的鲜卑人而言，既被奉为上宾，也最为一个时代的老师。如此，民族的杂居融合，自上而下浸透于整个王朝的多元文化共存，必然激荡出新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我们所见的在鲜卑人治下的北朝，充满了开放的气象，其国力也始终强于南朝。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这样描述当时南北风尚之差异：“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齐朝士子，皆呼祖仆射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对面以相戏者。”^①而这一不同于南方的开放、豪爽的民风，无疑与北朝复杂的民族构成、各种思想文化的兼容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休戚相关。不仅社会风气如此，在艺术上，同样体现出一种海纳百川、汇通中外的开放气度和丰富多彩的审美追求。如现存的山西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既保留了汉代石刻造像的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和笈多造像的艺术元素，中西合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再如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西凉乐》《龟兹乐》等，皆是从西域流入中原、并风靡一时的。《兰陵王入阵曲》《城舞》则是典型的鲜卑乐舞，不仅盛行于当时，也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滥觞，对后世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北朝独特的文化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开放型的价值观建构，体现于多个层面，从具体的社会生态到上层建筑诸领域。而其最终结果，就是为恢宏博大的大唐气象的形成作了很充实的准备。

（三）严酷的生存环境和长期的拓土征战，造就了北朝二百余年重实轻华的社会风气和任侠尚武的时代精神。

我们今天看南北朝人留下的著述，就会发现南人最瞩目的是那些华丽的辞章，是诗、赋、骈文之类的准文学作品。而北人都是些实用性很强的学术书，如酈道元的《水经注》实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学著作，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历史著作，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一部训诫教导子孙的书，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更是一部农学著作。这些书被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因祖是北齐权臣，士子对祖的态度，也印证了北地的“胡”气。



后人名之为文学典籍，实在有点勉强。但它很实用，对后世的贡献也远大于南人之作。那么，南北著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南北文化、社会风尚之差异，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诸多因素促成之，比如地理及自然环境、当下的社会现状等等。

就地缘环境看，北中国的冰雪严寒和大漠长风，肯定不比四季常青的水秀江南。《南史·王懿传》曰：“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瞻。若有一人不至，以为不义，不为乡邑所容。”^①待人以诚，粗犷豪爽，民风淳朴，这正是长期生活于北方苦寒之地惯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游牧民族的天性。据现存有关资料反映，囿于环境，北魏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尚简朴实用，远不似南方的精细讲究。如男女婚嫁，这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按理要有一整套仪式规矩，但当时北方民间迎娶普遍形式简单，且一改以往纳彩礼俗，双方皆以牲畜为聘礼，以求实用。尤其鲜卑男女，往往于“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②。这样的胡风胡俗，也足见民性之简朴、豪放。

鲜卑人入主中原后，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带入中土，大大改变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尽管上层统治者极力要“劝课农桑”，但饮奶食肉的习俗还是颇为兴盛的。其实，这一饮食习惯正是为适应北方的高寒环境。当时，在放牧季节，牧人一般一日一餐，只有高能量的奶、肉方能抵御风寒，支撑一天的漫长劳作。

严酷的环境和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使北朝社会下自黎民生活上至国之大政，皆偏于实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套路。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这样的国家大事，从断然迁都，到绝母语、改姓氏、禁胡服……一系列汉化的举措非常彻底，这是任何一个人主中原的异族君主都难以做出的选择，从中正映现了当时条件下鲜卑等北地少数民族追求实用主义的文化背景。而最能说明这一文化倾向的，当属他们对各自祖源的认同和追述。鲜卑人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分北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

① 《南史》卷二十五《王懿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72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985页。